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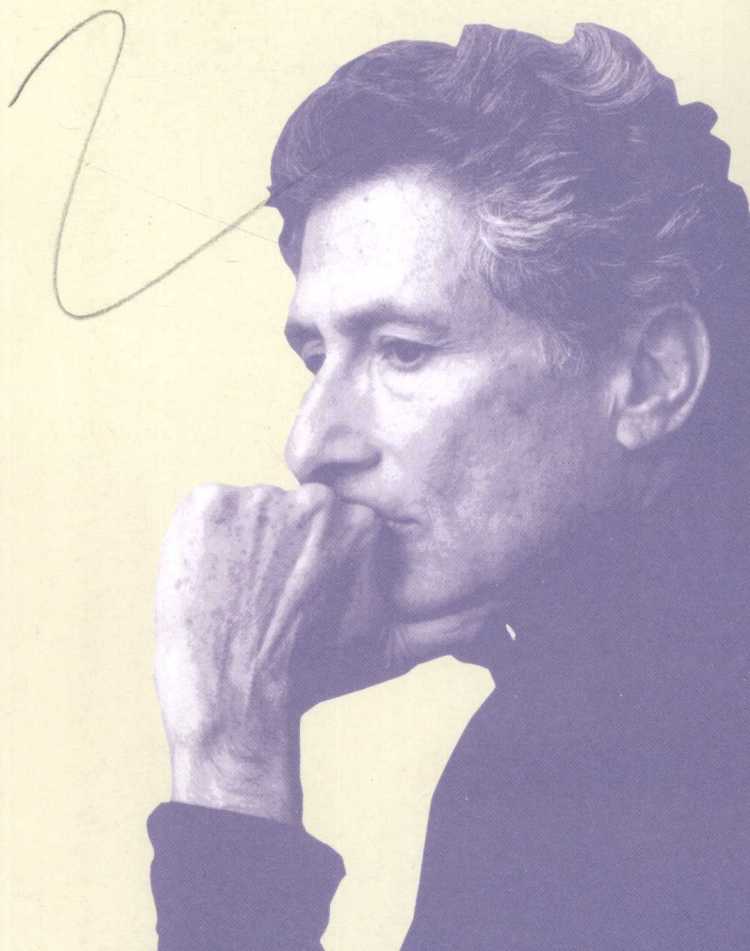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 及路线图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唐建军 译 涂险峰 校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map



萨义德作品系列

000107710

Edward W. Said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map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
及路线图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唐建军 译 涂险峰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 (美) 萨义德 (Said, E. W.) 著; 唐建军译, 涂险峰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9
(萨义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228-7

I. 从… II. ①萨…②唐…③涂…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430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5-539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 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8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经过同白血病的十年抗争，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9月与世长辞。此时，他可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颇有争议地描述了近代欧洲思想和文学中对于东方的擅取妄用。这部著作现已凭借其自身实力，繁衍出一个学科分支：在首次出版25年后的今天（《东方学》初版于1978年。——编者注），它仍在持续不断地激起人们的愤怒、敬仰和效法。即使它的作者再无其他作为，而仅将自身局限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书生涯——从1963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受聘于该校——他仍会是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然而，他却并没有这样限制自己。从1967年开始，随着岁月推移，中东局势愈益紧迫，民众情绪愈益高涨，而爱德华·萨义德也成为中东危机问题上的一位雄辩滔滔、无处不在的评论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倡导者。而这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积极入世行为，并未真正取代萨义德的知识旨趣——他对于西方无法理解巴勒斯坦人所受屈辱的批评，毕竟颇为真切地回荡着他在《东方学》以及后来的著作 [特别是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中解读19世纪学术和小说的声音。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还是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公众化的知识分子，受到数百万读者的热烈崇拜或同样强烈的憎恶。

对于一位与他的崇拜者和仇视者信心十足地指派给他的任何模式都不大相合的人来说，这是个颇具讽刺的命运。爱德华·萨义德毕生都同那些被与他关联起来的各种事业有所偏离。这位巴勒斯坦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的不自觉的“代言者”，却是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1935年出生于一个来自拿撒勒的浸信会教徒家庭。这位帝国优越感的毫不妥协的批评者，却曾就读于在当地培养欧洲帝国精英的最后一批殖民学校中的某一所；多年来他感到在英法居住比在阿拉伯更加自在，并且成为他永远都不会完全认同的西方教育的一个杰出样板。

爱德华·萨义德是从伯克利到孟买的大学里一代文化相对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偶像。对他们而言，“东方主义”包揽一切，从“后殖民”蒙昧主义（“书写他者”）的职业训练，到学术课程里对“西方文化”的谴责，概莫能外。但萨义德本人却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无稽之谈。激进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效果的观念，让他觉得既肤浅又“轻率”：正如他不止一次的评述之所言，人权“并非文化或者语法之物，而且，它们一旦遭到侵犯，就同我们的任何现实遭遇一样真实”^[1]。

至于对萨义德思想的普遍描述，即认为萨义德把（西方）作家解读成不过是殖民特权之副产品的说法，他则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不相信作家会机械地受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史决定。”的确，说到阅读和写作，萨义德是一位毫无愧色的传统人文主义者，“尽管那些老练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对这一词汇嗤之以鼻”^[2]。如果说有什么事让

[1]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 136.]

[2]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xxii];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25周年版本序言”[*Orientalism*, “Preface to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xxiii.]

他对年轻一代文学学者们感到灰心的话，那就是他们过分熟悉“理论”，并为此丧失了文本细读的技能。此外，他欣赏知识界的不同意见，认为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容忍分歧乃至争论，是学术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我本人对《东方学》的核心论点表示怀疑，但这绝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种态度使他的许多远距离崇拜者感到困惑不解，对他们而言，学术自由最多不过是有条件的偶然价值。

同样一种发自肺腑的人道主义冲动，使爱德华·萨义德与那些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偶尔表现出的另一个习性，即对于暴力的热烈支持——通常是隔着安全距离而支持暴力，并总是让别人付出代价——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敌人们习惯于把他刻画为“恐怖教授”，而事实上，他一贯批评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不像让-保罗·萨特这位在前辈中的影响与之不相上下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有一些现实暴力的切身体验——他在大学的办公室曾遭到破坏和洗劫，他和家人都曾受到死亡恐吓。但是，萨特毫不犹豫地将对政治谋杀作为既有效又具有净化作用的行动而予以鼓吹，萨义德却从不认同恐怖主义，无论他多么同情驱使它的动机和情绪。他曾写道，弱者应该采取使他们的压迫者感到不痛快的手段——某种令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平民的暴行永远望尘莫及的手段。^[1]

这并不是由于爱德华·萨义德本性温和，或者是个不抵抗主义者，更不能说他是个缺乏强烈责任感之人。虽然他在职业上取得了成

[1] 在1961年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法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萨特把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暴力描述为“人重新创造自身……击毙一个欧洲人是一石双鸟，同时摧毁了一个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脚下的民族土壤。”让-保罗·萨特：法农的《大地的不幸者》序言〔（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pp. 21—22〕。对照之下，萨义德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的模式是甘地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和纳尔逊·曼德拉（参见本书第2章“悲剧加深”）。

功，他对音乐充满了激情 [他是个技艺高超的钢琴家，是丹尼尔·巴伦勃伊姆 (Daniel Barenboim) 的挚友，有时还相互合作]，而且具有交友的天赋，但他在某些方面却是个时常义愤填膺之人——正如本书中的随笔频频显示的那样。然而，尽管萨义德认同巴勒斯坦事业，竭尽全力地促进和诠释它，却缺乏那种与某一国家发生毋庸置疑的隶属关系或者使得这位活动家或理论家不顾一切地奔向某个单一目标的理念。

相反，在我看来，他总是有点偏离他的亲近物。在这个流离失所的时代里，他甚至称不上是典型的流亡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被迫去国离乡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个可以追忆（或期盼）的地方：一个记忆中的——更常见的是误忆中的——故土，一个如果不能在空间上便是在时间上让这些流放的个体或社群藉以停泊栖身之所。巴勒斯坦人甚至连这个也没有。从未有过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因此，巴勒斯坦身份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来自往昔的参照。

结果，正如萨义德就在辞世前几个月曾铿锵有力地评论的那样，“我仍然未能理解爱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就是无根的四海为家者的典型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去爱并不是十分惬意或安全的，你将因此招致强烈的敌意，敌视者认为这样的无根状态代表了一种具有侵蚀性的精神独立。但它的确是一种解放：你瞭望的世界也许并不像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欣赏的景象那样令人慰藉，但是你却看得更加深远。如萨义德 1993 年所写，“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立场，即认为‘我们’应该仅仅或主要地对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予关切。”^[1]

这就是这位独立批评家的真实声音，面对权力说真话……发冲

[1] 参见本书第 35 章“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金字塔报》，2002 年 10 月 10—16 日）；另参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xxv]。

撞权威之异声：如萨义德在 2001 年 5 月的《金字塔报》(*Al-Ahram*) 上所说，“以色列知识分子是否有辱使命，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关心的是阿拉伯世界里的言论与分析之鄙陋。”这同样是这位特立独行的“纽约知识分子”，一个现在快要灭绝的物种发出的声音——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中东冲突，它让如此众多的人决定支持并认同“我们”和“我们的”。^[1] 这些随笔的读者将会发现，爱德华·萨义德绝非传统意义上代表冲突中某一方立场的“发言人”。

慕尼黑的日报《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r Zeitung*) 刊登了萨义德的讣告：“不痛快的人。”但恰恰相反，他的不朽成就，是要使别人不痛快。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位不足以感激的、经常令人恼火的卡桑德拉 (*Cassandra*)。他责骂他们的领导人无能——甚至比无能更糟。对于他的批评者而言，萨义德是一支避雷针，吸引着恐惧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既机智又有教养的人竟被冠以恶魔形象：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来说，他是所有威胁的肉体化身——无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对于充满了受难象征的美国犹太社会来说，他挑衅性地成为以色列本身所造成的受难者的毫不含糊的提醒者。而仅仅通过他在纽约这个地方的存在，爱德华·萨义德就成了一个讽刺性的、世界主义的、来自阿拉伯的提示者，提示他的批评者之狭隘。

本书收录的随笔覆盖从 2000 年 12 月到 2003 年 7 月这一时段。因此，它们引领我们依次走过从奥斯陆谈判的那个十年之末、第二次群众暴动的爆发及“和平进程”的最终破裂，到以色列对西岸和加

[1] 哥伦比亚大学赢得持久声望的表现是，它挡住了来自内部和公众的要求责难甚至开除萨义德的压力，这些责难源于他为了巴勒斯坦利益而进行的公开干预。

沙地区的再次占领、2001年的“9·11”大屠杀、美国对阿富汗的报复，以及美国对攻打伊拉克的长期酝酿——显然是汹涌狂暴、杀气腾腾的3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爱德华·萨义德连篇累牍而又迫不及待地评论中东地区的危险局势，至少每月拿出一篇文章，经常是多篇，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对此，他在2002年8月以前的文章中只字未提，此后也仅仅是不经意地一笔带过）。

除一篇文章外，这里收集的所有随笔都投稿于一家阿拉伯语报纸，即开罗的《金字塔报》，因此这些作品给爱德华·萨义德的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了解到他对阿拉伯听众不得不说的话。这些作品表明，萨义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持之以恒地追寻三个主题：迫切需要告诉世人（首先是美国人）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真相；同样迫切的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认识到并接受以色列的现实，以及与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反对派接洽；责无旁贷地公开谈论阿拉伯领导层的过失。

无疑，萨义德首先关注的是对他的阿拉伯同胞发表言论，并将他们批评得体无完肤。这里遭到最猛烈批评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当权政府，尤其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贪婪、腐败、恶毒、猜疑。这或许显得几乎有失公正，毕竟，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是美国；毕竟，是以色列过去曾经并且目前仍在涂炭着爱德华·萨义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但萨义德似乎觉得，至关重要的是将真相告诉他自己的人民，以关于他们自身的真相如实相告，而非冒险沉溺于“为了一己得失趋炎附势、有辱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历史形象”的行为（2000年12月）。

在这些随笔中，萨义德历数以色列行暴施虐的种种罪状（参见2000年12月的《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2002年8月的《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或2003年2月的《伪善纪念碑》等文），严

酷无情且令人沮丧地提醒我们，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政府是如何对被封锁隔离的巴勒斯坦社会敲骨吸髓的：虐待平民，这种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如今却被一个貌似和平的政府所认可。但是在萨义德看来，这些暴虐行为并不是某个好战的、一心收复领土的将军重新执政的偶然的、不幸的副产品，而是由巴勒斯坦人投身无足惋惜的近期“和平进程”所导致的可预见的——并且就萨义德而言，是已经预见了的——结果。

对于我们中间这些欢迎奥斯陆和平进程，并且随着它在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而满怀希望地期待守望的人来说，萨义德那不抱幻想的批评着实令人沮丧。但是，回想起来，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确的，而我们是错误的。按照以色列和平派所设想的，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巴勒斯坦人——所欢迎的情形，奥斯陆和平进程应该使双方建立信心，产生相互信任。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耶路撒冷的管辖、巴勒斯坦难民重返的权利、犹太定居点等问题——会放在“后来的”、“谈判的最后阶段”进行讨论。同时，巴解组织将在自治的巴勒斯坦领土的施政过程中取得经验和可信度，而以色列人将和平安宁地生活。最后，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人的和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将牢固稳定地比邻而居，他们的安全则由国际社会予以保障。

这是 1993 年 9 月在白宫草坪上签署的《原则声明》（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背后的前提。但是整件事却存在着巨大缺陷。正如萨义德提醒我们的，参加谈判的没有双“边”：有的只是以色列，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装备（据估计，是当今世界第四强）的现代国家，正在占领着在 30 年前的战争中所攫取的土地，侵略着这里的人民。而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一个被驱散的、背井离乡的、被剥夺了祖先遗产的社群，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领

土。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侵占者和一些被侵占者。在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优势就在于他们恼人的真实性：他们就在那儿，不会离去，而且不会让以色列人忘记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由于没有什么可放弃，巴勒斯坦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商议。与占领者“做交易”终究意味着投降——或通敌。这就是为什么萨义德把1993年的《声明》描写成“一个巴勒斯坦的凡尔赛”^[1]，以及为什么他预先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中辞职的原因。萨义德推理说：如果以色列需要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么巴勒斯坦人想要的那些东西——完整的主权、恢复到1967年的边界、“重返的权利”、共同拥有耶路撒冷——一开始就应该摆到桌面上来，而不是放在尚未确定的最后阶段去解决，然后才有以色列的“诚意”问题。

1993年，当最初的《声明》签署的时候，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只有32750户犹太定居者住宅单元。截至2001年10月，已有53121户，增加了62%，且未来还会继续增多。从1992至1996年，在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领导的工党执政之下，西岸定居人口增加了48%，加沙地区人口增加了61%。退一步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的这一稳步接管很难符合《奥斯陆宣言》精神。该宣言第31条（第7款）明确规定：“在关于永久状态的谈判结果出台之前，双方都不得发起或采取任何将会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状况的行动。”

同时，甚至就在巴解组织被授权管理剩余的巴勒斯坦行政区之时，以色列却在兴建“犹太”道路网，穿插交错于那些地区，为定

[1] 爱德华·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1969—1994年间争取巴勒斯坦自主的奋斗》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 xxxiv]。

居者及其他以色列人提供专用通道，方便其前往受到永久性军事设施保护的遥远的住宅区（和稀缺的蓄水层）。^[1] 整个行为的动力，部分来自以色列时间错乱地将土地与安全混为一谈；部分源于1967年以后出现的热衷收复领土的末世论（即援引《旧约》作为与一个宗派的上帝签订的某种真实的不动产契约）；部分则出自将领土扩张作为自身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持久狂热。从巴勒斯坦立场来看，其结果就是使得奥斯陆和平进程变成缓慢执行的痛苦绞刑，尤其是把加沙实质上变成一座由巴勒斯坦人看守的监狱，而以色列军队则据守在周边围墙之外。

接着，在2000年，经过长期延宕的“永久状态谈判”姗姗而来：首先在戴维营，然后希望渺茫地来到西奈（Sinai）半岛的塔巴（Taba）。爱德华·萨义德当然无暇理睬传统的美国见解，即认为克林顿总统和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总理实质上已做出让步，而尽管如此，忘恩负义的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却拒绝了馈赠。这并不是因为萨义德同情阿拉法特，而是因为戴维营的最初提议——正如坦妮娅·赖因哈特（Tanya Reinhart）在2000年7月8日的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上所述——显然是个“欺骗”。巴勒斯坦人将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的50%，一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通常是不连贯的行政区；以色列将吞并这块土地的10%；剩下的40%是“未定的”——但处于以色列的模糊管辖之下。

五个月之后，在塔巴，巴勒斯坦人被提供一个改善过的领土协议，这确实是他们可能希望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得到的最佳条件。但最

[1] 双方在经济上变得比以往更加互相依赖（以色列人依赖巴勒斯坦的廉价劳动力，而巴勒斯坦人则依赖以色列提供就业机会和进入市场的渠道），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隔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便会造成这种悖谬的结果。

终形成的巴勒斯坦国将依旧完全依赖以色列，并且很容易因为以色列的反复无常而受到伤害；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苦痛从未充分对待；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主权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动摇。的确，就连以色列在最后一刻的让步，也依旧受到被萨义德绝妙地称为“条件、资格和继承权限的强大阻碍（正如简·奥斯汀一部小说里的那份不断延期、客观上根本无法获得的不动产一样）……”

与此同时，巴拉克继续在定居点内扩张人口，而连他自己的谈判代表都将这些定居点视为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即使巴解组织领导人曾经打算将塔巴协议出卖给他们的委托人，他们也很难做到：在沙龙精心选择时机地造访圣殿山（Temple Mount）之后爆发的第二次群众暴动虽是巴勒斯坦人的一场灾难，但它却是由多年来——即奥斯陆谈判的这些年——的挫败和屈辱孕育出来的。正因如此，也基于他自身的原因，阿拉法特指示巴勒斯坦方不要签署协议。

塔巴谈判，尤其是戴维营谈判，是奥斯陆谈判种下的苦果，而且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巴解组织在参与和平进程中所犯的首要错误，充分地体现在它不可避免地拒绝其结果，又回顾性地怀疑整个谈判战略的行为。在2002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萨义德对巴解组织铁杆分子及其领导人毫不姑息，批评他们凭借手中权力，在以色列的宽厚监护之下，出色地担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傀儡式”地方长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残忍、独裁和不可思议的腐败的代名词”（《巴勒斯坦目前的选举》，《金字塔报》2002年6月13—19日）。

在为这家报纸撰写的其他文章中，萨义德写道，阿拉法特和他的圈子“已使我们的局势越来越糟”。“巴勒斯坦人（以及扩展到其他阿拉伯人）已被他们的领导人出卖并且无望地被误导了，”这些领导人既无崇高原则也无切实有效的策略。“阿拉法特已经多年

不曾代表他的人民、他们的苦难和事业。与阿拉伯其他类似领袖一样，他像个熟透的水果一样紧悬枝头不放，而没有真正的目的和立场”（《阿拉伯的分裂与派系斗争》，《金字塔报》2002年8月15—21日）。

那么，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如果巴勒斯坦领导层腐败无能；如果以色列政府甚至连自己做出的承诺都不兑现，更不用说会实现其对话者的愿望；如果各方都存在太多的恐惧和憎恶，那么，“两国方案”该如何实现，既然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甚至美国人——最终都在原则上接受了它？在此，爱德华·萨义德又一次几乎与任何人的意见都格格不入。

1980年，当萨义德首次公开提出一项“两国方案”时，他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和谩骂，其中来自阿拉法特本人的法塔赫运动组织的一点也不少。然后，在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迟迟地承认，可能的最佳结果确实就是将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属于以色列人，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一见识回响着萨义德所坚持的主张，即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来说，除了互利互惠的领土自主，别无选择。^[1]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一半的被占领土遭到剥夺；随着巴勒斯坦社会变成一片废墟，公认的巴勒斯坦版图变成由孤立隔绝的土地、被铲平的橄榄树林和被毁的房屋构成的满目疮痍的风景，在那里，受到羞辱的成年人在情绪愤怒、态度疏远的青少年那里迅速丧失主动权，萨义德得出了令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的结论。

以色列永远不会放弃西岸，至少不会让它处于完整统一的、可治理的状态。西岸和加沙地区可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除了一个

[1] 举例参见爱德华·萨义德：《谁为巴勒斯坦人辩护》（*Who Would Speak for Palestinians*），*New York Times*，May 24，1985。

罪恶的黑手党，有谁会想要承担“治理”它的任务？巴解组织设想的“巴勒斯坦”是个白日梦——而且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白日梦。不论是好是歹，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将会只有一个真实的国家：以色列。这不是乌托邦；它不过是抛开幻想的实用的实用主义。真正务实的办法在于接受这一事实并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它。“比拥有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什么类型的国家。”^[1]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爱德华·萨义德一直坚持不懈地提倡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构建一个单一的、世俗的国家。

爱德华·萨义德坚持“一国方案”的信念，坚持用一个非排他性的、世俗的、民主的选择来取代目前的僵局，其理由何在？首先，目前的现状十分恶劣，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两个民族，都依靠关于自己是唯一受害者的叙事来自我维持，为了同一块弹丸之地，跨过自己孩子的尸体，无休无止地争斗。他们中的一方是武装国家，另一方是没有国家的人民，但此外他们又令人懊恼地彼此相似：归根结底，巴勒斯坦的民族叙事，如果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面具有谴责意义的镜子，不是一个驱逐、离散、再生和回返的故事，那又是什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这块有争议的“故国”分开而实现互惠双赢。这样的两个小国，彼此互相仇视，而其中每个国家里都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选民致力于毁灭和吞并它的邻居，这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局。

其次，巴勒斯坦状况已发生某种根本变化。四十年来，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被占领土、横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营以及流放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几乎都不为人所察。他们的存在本身长期以来遭到以色列政客们的否认；关于他们被驱逐的遭遇

[1] 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liii 页。

的记忆，在官方档案中受到删除，在历史书中也被省略，只字不提；关于他们家园、村庄和国土的记载，都已从这块土壤上清除。正如萨义德指出的，这就是他不断讲述这同一故事的原因：“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它维系；除非你不停地讲述它，否则，它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消失。”然而，“要想长达 50 年地拥护一个不断失落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似乎除非有人实施恐怖主义暴行，否则巴勒斯坦人就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暴行发生时，仿佛那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来源无法确定，他们的暴力无法说明。^[1]

这就是为什么“回返权”问题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要求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严肃认真之人认为以色列会“接回”数百万难民及其后代，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对于得到承认的需要：要承认早先的驱逐确曾发生，承认初始错误确实犯有。这就是奥斯陆协议让萨义德十分恼火的原因：它似乎打算原谅或宽恕以色列的占领及其他每件事情。但是“在进一步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难之后，不能就这样原谅以色列，不能连让它在言辞上对所作所为进行谢罪的要求都不提一下，就允许它离开谈判桌”（《奥斯陆代价几何？》《金字塔报》，2002 年 3 月 14—20 日。加点字部分是我的强调）。对此必须予以关注。

但是，人们目前确实正在关注。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世界舆论对巴勒斯坦悲剧的看法与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看法基本相同。他们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居民，一个在自己的故土被革去国籍的本土社群：他

[1] 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viii 页，118 页。若要了解以色列考古学家和官僚在以色列清除涉及巴勒斯坦往昔的所有证据时是多么明显地穷尽一切，可参见梅隆·本维尼斯提（Meron Benvenisti）的《神圣的风景：自 1948 年以来关于圣地的被埋葬的历史》[*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们被剥夺财产，被放逐驱赶，地产被非法征用，被限制在“班图斯坦”，被拒绝给予许多基本权利，并且每天每日遭受不公和暴力。今天，深谙内情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有哪怕微乎其微的借口，来说明阿拉伯人在1948年是自愿或是在外国暴君的强制之下离开的，就像我们曾被灌输的那样。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是以色列在该领域的一位领衔学者，他最近在以色列日报《国土报》上提醒读者说，在1948至1949年的一次早期的、不彻底的种族清洗尝试中，以色列士兵不只是驱逐了巴勒斯坦人，而且还犯下了战争罪，其中包括强奸和谋杀妇女儿童。^[1]

当然，莫里斯声名狼藉地对这一历史记录中的过错视而不见——他视之为建国兴邦历程中的附带伤害。^[2]但是，这就让我们有了第三个理由认为萨义德关于单一国家之契机的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正当巴勒斯坦事业已开始得到公众舆论支持，并在道德领域逐渐占据上风之时，以色列的国际声望也在急剧瓦解。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无法克服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被法国殖民者或荷裔南非人，而是——用萨义德的话来说——被“以色列的犹太公民，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背负着种族灭绝与迫害之悲惨历史的人们”驱逐、殖民、占领和普遍虐待。

由受害者造成的受害者，正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之中——而且，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由于阿拉伯人试图以淡化或否认的方式将它从大屠杀的阴影中挤出来的倾向，而变得更为糟糕。^[3]但是，

[1] 本尼·莫里斯，2004年1月8日接受《国土报》的采访。

[2] “我认为1948年的驱逐不是战争犯罪。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蛋糕。”《国土报》，2004年1月8日。

[3] 参见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viii页及《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Barenboim and the Wagner Taboo*），《金字塔报》，2001年8月16—22日。